『中國學』第65輯 (2018.12) DOI http://dx.doi.org/10.14378/KACS.2018.65.65.13
pp.217-227 ISSN : 1229-9618

《朝鲜王朝实录》中的苏轼记事特征

安熙珍*

【目 录】

1.《朝鲜王朝实录》概要
2.《朝鲜王朝实录》中的苏轼记事研究方法
3.《朝鲜王朝实录》中的苏轼记事类型
1) 引用苏轼有关言官重要性的文章
2) 引用苏轼对政策的意见
3) 礼法上引用苏轼文章
4) 对苏轼的非难或贬斥
5) 其他相关情况
4.《朝鲜王朝实录》中的苏轼记事特征

【摘要】

《朝鲜王朝实录》是韩国编年体汉文历史文献，记载了朝鲜王朝由始祖太祖至纯宗时代的27代君主共519年（1392-1910）的历史事实。朝鲜王朝历时五百多年，受到中国明朝与清朝的巨大影响，因此，《实录》里保存着双方各个方面的史料。这些史料来看，朝鲜时期的官僚文人对中国先贤极为推崇，并频繁引用他们的诸多论断或诗文，来充当自己论述或文章的依据。而这其中，苏轼是被引频率最高者之一，而其<上神宗皇帝书>几乎是朝鲜官僚人手必备的一篇名文。

【关键词】朝鲜王朝实录；唐宋八大家；苏轼；上神宗皇帝书；言官。

* 檀國大學校 中國語科 教授 (china@dankook.ac.kr)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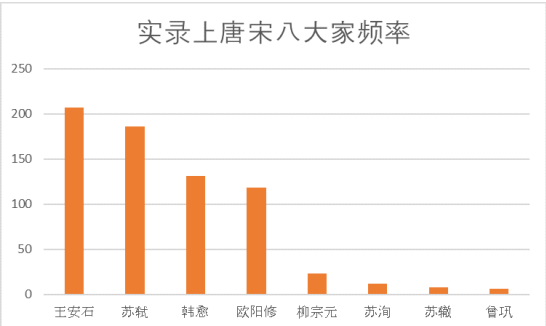
1. 《朝鲜王朝实录》概要

《朝鲜王朝实录》（以下简称《实录》）是一部重要的韩国编年体汉文历史文献，记载了朝鲜王朝由始祖太祖至哲宗时代的25代君主共472年（1392-1863）的历史事实。该书详细收录了关于朝鲜王朝时代的政治、外交、军事、经济等方面的诸多史料，历来被认为是研究朝鲜史的基本依据，并于1997年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登记为世界记忆项目。《实录》包括“太祖”“定宗”“太宗”，直至“哲宗”的二十三部实录，以及“燕山君”与“光海君”的两部日记（体裁与实录相同）。日本朝鲜总督府曾编纂《高宗实录》与《纯宗实录》，详细记载了高宗与纯宗两代的史实，虽然没有得到韩国及朝鲜历史学家的认可，但也具有相当大的参考价值。因此，若将最后两任君主的纪录也计算在内的话，《实录》共记载了27代君主，时间跨度达到519年（1392-1910），全书共1893卷，888册，总计约6400万字，可谓煌煌巨著，其价值不可估量。

2. 《朝鲜王朝实录》中的苏轼记事研究方法

目前韩国国立“韩国古典翻译院”已将众多韩国古代汉文文献材料翻译成韩文，并在网站上（http：//www.itkc.or.kr/）向公众开放，这其中就包括了整部翻译成韩文的《实录》，网址为：http：//sillok.history.go.kr. 上网站提供的汉韩数据库，任何人都可以浏览，无需注册与登录。（目前只有韩文与英文主页，尚未提供中文主页）

朝鲜王朝历时五百多年，受到中国明朝与清朝的巨大影响，因此，《实录》里保存着双方的政治、外交、军事、制度、法律、经济、产业、交通、通讯、社会、风俗等各个方面的史料，不少中国文人以及各类文集文献也收录其中，时有所见。在这些纷繁复杂的材料里面，笔者最为关注的是，作为中国古代文人的杰出代表，唐宋八大家中哪几人对朝鲜文人的影响最深，而哪几人又在《实录》里出现的频率最高。而据网站提供的材料进行初步统计，将唐宋八大家按频率多寡排列如下[1)]：王安石207次、苏轼186次、韩愈131次、欧阳修118次、柳宗元23次、苏洵12次、苏辙8次、曾巩6次。



很明显，欧阳修、王安石、苏轼与韩愈在《实录》中出现的频率最高，这说明以上四人受到了朝鲜王朝文人的极大重视。本篇论文即以实录里的苏轼为例，探讨当时朝鲜王室与朝鲜文人对苏轼的态度与认识。含有苏轼的186条材料当中，我们以直接或间接

1）统计时以各家最有代表性的名、字、号为准，如：苏轼、东坡、苏文忠公、子瞻、韩愈、韩退之、柳宗元、柳子厚等，频率极少的其他称呼直接略过。

引用苏轼文章的部分为重点。通过分析这些材料，可以揭示为何朝鲜文人会经常引用苏轼的文章来说明问题，以及佐证自己的观点和意见。

3.《朝鲜王朝实录》中的苏轼记事类型

通过内容分类与数量统计可知，《实录》中苏轼记事频率最多的为以下五种类型：1.引用苏轼有关言官重要性的文章；2.引用苏轼对政策的意见；3.礼法上引用苏轼文章；4.对苏轼的非难或贬斥；5.其他相关情况。

1）引用苏轼有关言官重要性的文章

一般来说，历史上的“言官”，指的是高丽时期御史台的台官与中书门下省郎舍下属的谏官等官职的统称。在朝鲜时期的王宫里，言官是非常重要的职位。太宗时期司谏院上书中说：“苏子瞻曰：‘擢用台谏，未必皆贤，所言未必皆是。然须养其锐气，借其重权者，岂徒然哉！将以折奸臣之萌，而救内重之弊也。’古之人君，重台谏如是，故前朝盛时，台谏胥徒，人莫敢挫；居是官者，争相励节，莫不以振纪纲、陈善道为任。”（《太宗实录》卷五）文中所引苏轼之语，出自其《上神宗皇帝书》。从《实录》的现存诸多材料来看，苏文这一名篇，被朝鲜官僚在很多场合反复引用。

又太宗时期，台官上书主张从赵大临手中收回兵权，太宗认为这一建议必有幕后主使之人，于是下令将司宪府持平赵瑞老等几名言官处罚流放。引发此事的导火索，就是赵瑞老等人的上书，在其上书的最后部分，就引用了苏轼《上神宗皇帝书》中的一段文字：“夫为臣而不能讨其不忠，厥罪惟均，岂不殆哉！苏轼曰：‘台谏所言，当随天下公议。公议所与，台谏亦与之，公议所击，台谏亦击之。’伏望殿下断以大义，将无咎、无疾置之于法，永为垂世之规。”（《太宗实录》卷一七）赵瑞老引用苏轼之文，一方面指出王室这一决策的不妥当性，另一方面也强调了台谏角色的重要性。

又太宗时期，司谏院上疏请求废止吏部考功谏官的规定。让吏部重新评估司谏院，其真实目的在于借此削弱谏官的言官力量和推动力，而司谏院的奏书中就多次引用了苏轼的文章来反驳，如：“其在圣朝，犹云可也，其末流之弊，可胜言哉？苏轼云：‘选用台谏，未必皆贤，所言未必皆是。然须养其锐气，借其重权。’[2]臣等器识庸陋，学问空疏，幸际圣明，得备言官，虽无补衮之效，常怀犬马之诚，欲报圣恩之万一，今被诠曹考功之法，臣等实有憾焉。”（《太宗实录》卷三〇）司谏院引用苏轼之文，强调了言官的必要性。

又成宗时期，司宪府大司宪李恕长等上箚子记载：“大臣位高势重，昵承人主顾问，于是而忌谏官言事，此专擅纵恣之渐也。苏轼云：‘言及乘舆则天子改容，事关廊庙则宰相待罪’，今锡文不惟不待罪而又掩过，其意何欤？”（《成宗实录》卷四八）引用苏轼之文，强调了言官的角色

2)《朝鲜王朝实录》上被引用的苏轼文章中与<上神宗皇帝书>原文有稍微出入的，在此不必论及。

和重要性。

又成宗时期，持平成健欲阻止奸臣韩明浍专断国政，因此上书曰："苏轼有云：'权臣之始起也，以台谏折之而有余，及其既成也，以干戈取之而不足。'明浍权重大臣，其不道之言如彼，今不治罪，则恐必有末大难掉之患也。"（《成宗实录》卷六五）持平成健引用苏轼《上神宗皇帝书》之语，以说明言官的重要性与局限性。

此外，司宪府大司宪李琼仝等上疏请治频繁私用军士的柳子光之罪，曰："欲正朝廷之得失，使大臣不得专权，小臣不敢献谀，整肃朝纲，维持风宪也。昔苏轼曰：'委任台谏，是圣人过防之至计。言及乘舆，则天子改容；事关廊庙，则宰相待罪。盖擢用台谏，固未必皆贤，所言亦未必皆是。然须养其锐气而借之重权者，岂徒然哉？将以折奸臣之萌也。'"（《成宗实录》卷一九六）再次引用了〈上神宗皇帝书〉的论述。

另外，成宗在夕讲上读到《唐昭宗纪》的一段记载，便问身边的侍臣曰："此言何如？"同副承旨金季昌说："昔宋主问苏轼曰：'节义之士，何以识之？'轼对曰：'平时尽言极谏者，节义之士也，阿谀顺从者，奸臣也'，此言良是。节义之士，世不多得，前朝五百年，唯郑梦周、吉再二人而已。"（《成宗实录》卷九三）此段记载的原始出处虽已不可考，但朝鲜官僚向王室上奏或与王讨论的过程中，经常引用苏轼《上神宗皇帝书》的内容向王谏言，是确凿无疑的事实。

以上材料所引苏轼言论，多以劝导君王勤与百姓沟通，并虚心听取接纳臣民诉说为主。左副承旨李德洙被贬之时，领议政尹昉上札子曰："今此诸臣之尽言无讳，亦恃圣明包荒之量，而不欲以三代以下，望乎吾君，其亦何罪？……宋臣苏轼之言曰：'本朝立国仁厚，仁宗皇帝临御四十年，未尝罪一言官，社稷长远，终必赖之。'臣三复斯言，区区有望于圣明者，前后札陈，既已尽之矣。"（《仁祖实录》卷三〇）文中所引之语化自苏轼〈上神宗皇帝书〉"而自建隆以来，未尝罪一言者，纵有薄责"一段。

为了增加说服力，论者经常大量引用苏轼的文章，即使其出处不明，如："讲《性理大全》，至论君子伏节死义，侍讲官表沿沫启曰：'苏子瞻云："平时无直言敢谏之人，则临乱无伏节死义之士。"（此段苏文出处待考）盖人主之威，甚于雷霆，非忠臣爱国之至者，其能直言敢谏乎？谏官之言，虽或过中，亦当优容。'"（《成宗实录》卷二六〇）由此可见，朝鲜王室君臣上下均十分重视苏轼〈上神宗皇帝书〉与其治国理政的思想。

宣祖时期，倭寇入侵，国政混乱，君臣慌乱之际宣祖准备将政务交由东宫处理。此时很多官僚上奏劝谏宣祖不可在患乱时期让年轻的东宫摄政，承政院上书曰："……今此下教，极为未安，又不得奉而行之。臣等所安，只有一死而已。苏轼有云：'天下治乱，在于下情之通塞。治平之世，小民皆能得达，大乱之极，至于近臣不得达。'今日之事，殆有甚焉。伏愿平心察理，不远而复。"（《宣祖实录》卷七九）所引苏文出自其〈朝辞赴定州论事状〉，原文为："右臣闻天下治乱，出于下情之通塞。至治之极，至于小民，皆能自通。大乱之极，至于近臣，不能自达。"

又仁祖时期，郑晔因私下囚治宫奴而被处罚调任，申钦乃上札曰："牵裾者近于不恭，焚诏者涉于悖妄，而前史以为美谈，先儒不以为非者，良以人主不为包容，则无以来直言而作士气也。苏轼有言曰：'欲求死节之臣，常于犯颜敢谏中。'（此段苏文出处待考）求之衰叔之也，风励鼓动，犹恐其偷靡，可不慎欤？臣非敢为台官左右之也，治道所关，不敢不陈。"（《仁祖实录》卷七）以上所引，足以证明朝鲜王朝官僚一再引用苏轼的文章来保护并巩固言官的地位。

成宗时期，司宪府大司宪许琛、司谏院大司谏尹愍等上书劝谏成宗采纳其自我弹劾的意见，并甘愿接受贬谪的处罚。成宗驳回其要求，并称赞诸人敢于进言，批答曰："苏东坡云：'不可以无鼠而畜不捕之猫。'（此段苏文出处待考）岂可以时无可言之事，而不择台谏，使不言者处之乎？是以择如卿等者处之，卿等此言当矣。"（《成宗实录》卷二九〇）朝鲜君臣都十分重视言官职能的正常发挥，因此一再引用苏轼之语。

又文宗时期，集贤殿直提学朴彭年上书开进推荐官吏的问题，曰："'申明保举之法，罪及举主，则弊可救也'，臣以为不可。苏轼尝论举主之法曰：'知人，尧舜所难。今日为善，而明日为恶，犹不可保。况于数十年之后，其幼者已壮，壮者已老，而犹执一时之言，使同被其罪，不已过乎？莫若令长官，各察其属，属有罪，而长官不举者，同罪。然则贪利小人，无容足之地矣。'臣亦持此论，久矣。"（《文宗实录》卷四）此处所引苏文，与苏轼〈策别课百官五〉基本思想一致，文辞略有小异。

2) 引用苏轼对政策的意见

世宗期间，工曹参判李蓁上书表示，建立义仓的政策是"其上户则以传给穷民，书其转给之数，积以岁年，数登若干者，拜以爵级以宠异之，则富人乐输，贫人受赐矣。有宋苏轼曰：'常平之法，所守约而所及广。借使万家之邑止有千斛，而谷贵之时，千斛在市，其价自平。一市之价既平，一邦之食自足。'"（《世宗实录》卷八七）苏轼虽然反对王安石的新法，但对一些切实给老百姓带来帮助的政策则表示了积极的赞同。因此，这里引用苏轼之语来论证建立义仓的妥当性，明显化用自苏轼《上神宗皇帝书》："且夫常平之为法也，可谓至矣，所守者约，而所及者广。借使万家之邑，止有千斛，而谷贵之际，千斛在市，物价自平。"

肃宗时期，右参赞尹鑵上书反对"常平法"，曰："汉宣用常平之法，而民甚便之，及晚宋乃有青苗之法，而民始怨苦。苏轼所谓：'其与之也，虽良民，不免妄用；及其收之也，鞭挞必用，而官府多事'者，实切至之论也。我国《大典》有常平之制，而无还上之法。还上盖肇于近岁，而实仿王安石之青苗，乘时敛散，乡县富户长利之事，本非王者所宜行也。今日官府之多事、官吏之奸滥、兵民之愁痛、逃户之半国、冻馁之满狱，悉由于此也。"（《肃宗实录》卷六）"常平法"与北宋王安石的青苗法一样，是一种赈济农民的粜籴制度。表面上看，该政策能够救恤贫困农民，而实际执行过程中却暴露出一系列问题，所以苏轼撰写〈乞减价粜常平火赈济状〉、〈上神宗皇帝书〉等文章一再上疏，对青苗法表示了强烈的反对意见。因此，尹鑵引用苏轼之论来指摘"常平法"的隐患。

又肃宗时期，王和君臣讨论课税政策，右尹朴权就良役的调整向肃宗陈疏曰："唐之租、庸、调，先儒称其三代后良法。所谓调者，即家户之役，而未有贵贱区别之文。宋臣苏轼之疏曰：'今世三大户之役，自公卿以下，无得免焉。'唐宋之世，公卿之不蠲户役，可以推知。况今中外许多以两班为名者，其可独免一国男女所共出之户赋，而国家亦将忧其招怨，不思所以均役之道耶？"（《肃宗实录》卷五〇）所引苏轼之语出自其《上神宗皇帝书》，原文为："今世三大户之役，自公卿以降，毋得免者，其费岂特三百而已。"

纯祖时期，光州牧使宋知濂、顺天府使赵晋和等6人联名上疏曰："至于钱米之拨赐，宋高宗

之所施于绍兴者，我殿下可不施之于湖南乎？麦前接济之方，必有庙议之商确。而苏轼之言曰：‘熙宁荒政，费多无益，以其救之之迟也。’今之事势，稍缓一日，则诚有空费无益之虑。”某一政策的实行常有陷于纸上谈兵之虞，该疏文中先已引用韩愈和朱熹的文章，又引苏轼之语来指摘其‘费多无益’的问题，并强调：“伏愿圣上即降明旨，钱布之可以拨赐者，谷物之可以移转者，亟令区划，俾近止之民命，得以回苏。”（《纯祖实录》卷一二）

世宗时期，集贤殿直提学李季甸对当时土地课税之‘贡法’的弊端，提出了自己的意见：“则贡法之便否、民心之好恶，不待论辨而自见矣。善乎！先儒苏轼之言曰：‘方其未有贡也，以贡为善也，及其既贡，而后知其有不善也。’今不善之实，既已验矣，乃何固守而不变乎？兴一利，不如除一害；生一事，不如减一事。”（《世宗实录》卷一一二）以上所引足以证明，朝鲜官僚普遍认为苏轼的观点是合情合理的。

3）礼法上引用苏轼文章

朝鲜官府仪礼详定所上书曰：“《文献通考》，苏轼曰：‘古者坐于席，故笾豆之长短、簠簋之高下，适与人均，今土木之像，既以巍然于上，而列器皿于地，使鬼神不享则不可知，若其享之，则是俯伏匍匐而就也。’”建议祭礼时“请自今各位奠物，并用卓子而设，除铺席。”（《世祖实录》卷二三）此处出自苏轼《私试策问八首：庙欲有主祭欲有尸》。

虽然礼法的内在本质大于外在形式，但仍旧应当遵循实际内容而定，不可随便忽略。光海君时期，宣祖驾崩，下册封王世子的典礼上，君臣之间就服装形式的问题展开讨论。礼曹上书以“后世苏轼论周康王释冕返丧服之失曰：‘既成服，释之而即吉，无时而可者’”之论来强调传统礼法。然而《尚书・周书・康王之诰》云：“群公既皆听命，相揖，趋出。王释冕，反丧服。”（《光海君日记》卷三）且朝鲜礼曹引用苏轼之语无法确认出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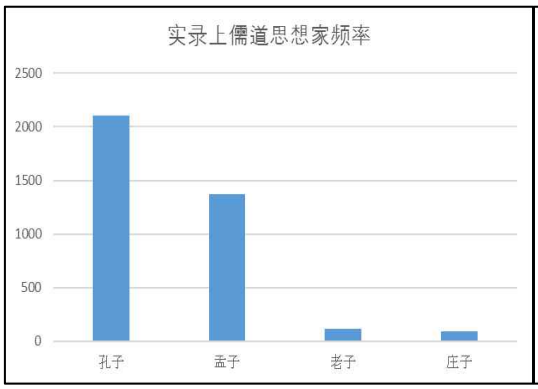
对于苏轼同一文章的不同态度也时有出现，如正祖时期有记录曰：“及英宗大渐，王，永浆不入口，哭不辍声。既成服，王曰：‘迫于群情，忍将践位，而冕服行礼，于予心益觉怵然。此礼见于《康王之诰》，苏轼讥其非礼，亮阴之制，虽不得行，释衰从吉，其可乎？’群臣以古礼与国制，力请，王，泣而从之。”（《纯祖实录》卷二四）正祖即位典礼时想起苏轼的话，便文近臣穿“吉服”是否合于礼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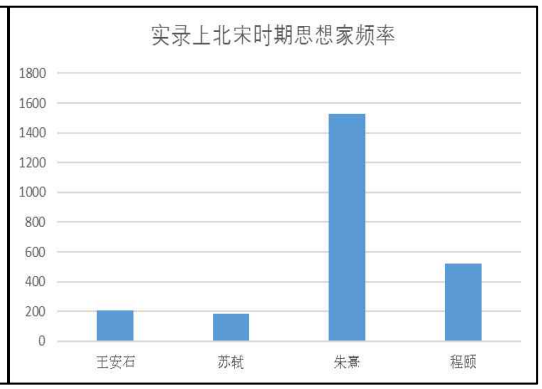
世宗时期，郑麟趾等人向明朝使者提问如下问题：“《康王之诰》：‘将冠子，遇大功服，如之何？’苏东坡以为：‘麻冕彤裳可也。’朱子以为：‘冠，吉礼也，以吉服为之可也。’未知孰是，朝廷从何说乎？”使臣曰：“从朱子之说。”（《世宗实录》卷一二七）服丧时期的服装与即位典礼上的服装，在礼法上是相互冲突的，而此时朝鲜王宫的君臣便引用苏轼的文章来讨论。

4）对苏轼的非难或贬斥

以上讨论限定于唐宋八大家中苏轼一人，然而在《实录》中出现频率最高的还是孔子与孟子。儒道四子的出现频率如下：孔子2108次、孟子1368次、老子114次、庄子90次，孔孟竟然有老

庄的十倍之多，这足以证明朝鲜王朝的主导思想是儒家。此外，虽然我们以苏轼为例来探讨《实录》中的引用状况，但纵观整部《实录》，“朱子（熹）”出现的总次数为1528次，其频率不但远远超出其他唐宋人物，甚至超过了孟子而直逼孔子，列表如下：





仅从四位北宋代表思想家在《实录》的出现频率来看，王安石与苏轼远不及朱熹与程颐，这一现象非常明确地显示出，儒家思想尤其是“理学”，在朝鲜王朝占据着主导地位。因此，从整部《实录》来看，就出现了不少否定苏轼、非难苏轼的论断。

例如：“参赞官李自坚曰：‘宋之时，两程为真儒，而苏轼诽诙不正，故其徒相为诋毁，至于立党，今岂无如此之习乎？愿殿下深察，其有学行者，褒奖之；轻薄无行者，惩罚之。’”（《中宗实录》卷一二）这种观点代表了朝鲜时期许多文人对苏轼的普遍态度。

又如：“司经孙洙因讲《近思录》曰：‘伊川为宋时理学之祖，而苏轼指为伪学。非徒宋时为然，乃古今所通患也。’特进官姜澂曰：‘一时趋向，皆系于人君之所尚。理学本也，文艺末也。人君惇尚理学为贵也。’上曰：‘道学，自孟子而后，只有宋儒，而指为伪学，果后世亦有欲为理学，而不无指为伪学之言矣。然必为理学而后，可也。’”（《中宗实录》卷三〇）

中宗时期，在夕讲上参赞官赵光祖曰：“苏轼亦云：‘乞斩程颐之奸。’轼亦一时有名之士，而至于此也。必须人君好恶是非公明正大，然后无惑于邪说也。且不先正士习，而若至于危乱之时，谁肯有立节者乎？”（《中宗实录》卷三二）赵光祖此论固然有合理，然而苏轼文章里却没有“乞斩程颐之奸”等语。事实上，苏轼的确对程颐等人持有不同观点，其于《杭州召还乞郡状》中曾曰：“光初不以此怒臣，而台谏诸人，逆探光意，遂与臣为仇。臣又素疾程颐之奸，未尝假以色词，故颐之党人，无不侧目。自朝廷废黜大奸数人，而其余党犹在要近，阴为之地，特未敢发尔。”又如于《再乞郡札子》中曾曰：“而事有难尽言者，臣与贾易本无嫌怨，只因臣素疾程颐之奸，形于言色，此臣刚褊之罪也。而贾易，颐之死党，专欲与颐报怨。因颐教诱孔文仲，令以其私意论事，为文仲所奏。颐既得罪，易亦坐去。”因此，赵光祖借苏轼的意见来强调判断是非的艰难。

明宗曾在思政殿上召集彦阳县监林薰等四位官僚讨论治理方策，林薰曰：“苏轼论学，不言诚正，先儒以为不知为学之本。”（《明宗实录》卷三三）

宣祖时期，在丕显阁进行夕讲时，奇大升曰：“其时有苏轼者，所谓苏东坡也。有文章才

器，而心不能正，与程子不合，使孔文仲上疏驳之，愉污乡党，指为五鬼云，而仍以为西京国子监。”（《宣祖实录》卷一）

又宣祖六年1月21日君臣于经筵上讨论，柳希春曰：“孔文仲以愚直之人，为苏轼所欺，其弹章曰：‘上德未有嗜好，而每戒以无好酒色。上意未有信向，而每戒以勿用小人。’”（《宣祖实录》卷七）其实苏轼对孔文仲非常赞赏，平时的关系也很密切。孔文仲去世的时候，“苏轼拊其柩曰：‘世方嘉软熟而恶峥嵘，求劲直如吾经父者，今无有矣！’诏厚恤其家，命弟平仲为江东转运判官，视其葬。”（《宋史》）柳希春等人对苏轼持有较为顽固的偏见，

又宣祖六年12月10日君臣昼讲，“讲讫，赵廷机启曰：‘顷日宣取东坡，此人心术不正，其书不宜御览。’上曰：‘不以人废言。若以人之不正，而废其书，不亦偏乎？’宇颙启曰：‘苏轼文章伟丽。然其心术不正，故其书有矜豪谲诡之态，亦非知道君子所欲观。朱子详论之矣。’上曰：‘予闻在下诸臣，皆好看东坡。’”（《宣祖实录》卷七）

又有宣祖六年12月21日经筵记载曰：“台谏、承旨进言，希春进于其后曰：‘顷日，上命入东坡诗，臣未知上欲者一二处耶？欲留览耶？苏轼为人，矜豪诡谲，心术不正，发于文词，亦皆不平。是故芮晔掌学校之政，朱子遗书论曰：“苏氏以雄深繁妙之文，扇其倾危变幻之习，以故人之被其毒者，沦肌浃髓，而不自知。”今正当拔本塞源，庶乎可以障狂澜而东之。自上若欲兴于诗，则有朱子《感兴诗》二十首在，盖皆五言，凡一千二百六十字之中，天地万物之理，圣贤万古之心、古今万事之变，无不在焉。音韵铿锵，兴致悠远，吟咏之间，意味深长。以此诗，易在彼幸甚。’尹晛言苏轼媚嫉伊川之事。希春曰：‘苏轼语道德则迷大本，论事实则尚权谋贵，通达而贱名检，衒浮华而忘本实，漠然而不知礼法廉耻之为何物。是以见伊川之规矩准绳，其忌恶之甚，如薰莸冰炭之相反也。臣尝观宋高宗好观苏黄诗，君子不能无憾。况以殿下圣明，岂可如此乎？’说毕而退。”（《宣祖实录》卷七）

5）其他相关情况

以上材料之外，在《实录》中仍有不少论及苏轼诗词或引用苏轼文章的内容。如成宗时期，司谏院大司谏成俔等、司宪府执义尹慤等，反对以官职赏赐的政策时上疏曰：“臣等窃惟，《书》曰：‘玩物丧志，玩人丧德。’宋朝苏轼，有言曰：‘君子可以寓意于物，而不可留意于物。寓意于物，虽微物足以为乐，虽尤物不足以为病；留意于物，虽微物足以为病，虽尤物不足以为乐。’善哉言乎！夫人心，操舍之无常，圣狂转移之甚易，苟或留着于物，则反为物之所役，苟为物之所役，而不能脱，则六经之外，皆丧心之地也。”（《成宗实录》卷一〇八）这是苏轼《宝绘堂记》中的一段文章。

在成宗时期，面临旱灾行副护军任淑上疏曰：“臣区区以祀天祷雨，望于殿下者以此也。臣闻，宋苏轼曰：‘五日不雨，则无麦无禾。’岁且荐饥，狱讼繁兴，盗贼滋炽，近日忠清一道之事，足为明鉴。”（《成宗实录》卷一四三）此处出自苏轼〈喜雨亭记〉。

中宗时期，成均馆生员辛百龄等为赵光祖申冤而上疏曰：“可以殿下，不如汉灵乎？宋臣苏轼有诗曰：‘吊古泣古史。’殿下尝于万机之暇，目击前史，见有奸臣之欺罔人主，诬陷良善者，则犹必掩卷而不忍，况亲于殿下之世见之乎？”（《中宗实录》卷一〇三）此处所引诗句出自苏轼

《游惠山》。

孝宗时期，舍人洪处尹上疏曰："宋臣苏轼以惧灾之道，言于其君曰：'譬如人子，得过于父母者，惟有恭顺静思，引咎自责，庶几可解，今乃纷然诘责奴婢，恣行棰楚，以此事亲，未有见赦于父母者。'"（《孝宗实录》卷九）此处所引出自苏轼《代张方平谏用兵书》。

还有显宗时期："上受针后，引见药房诸臣，玉堂亦请对。修撰金万重曰：'昔蔡襄守闽中，进建茶，欧阳修曰："君谟士人，而何至为此"，钱惟演守西京，进牡丹花，苏轼有"洛阳相公忠孝家，可怜亦进姚黄花"之句，今寿兴之事，亦可惜也。"（《显宗实录》卷一四）此处所引出自苏轼《荔枝叹》之一联。

英祖时期，大司谏洪景辅左迁为稳城府使，洪景辅批评当时的朋党问题，上疏曰："宋臣苏轼论东西汉风俗之变曰："西汉之衰，靡然如蛟龙释风云之劳，而安于豢养之乐；东汉之衰，如人之病狂，不知堂宇高室之为安，号呼奔走，以自颠仆。"臣尝目见数年前党论盛时，士大夫力为新奇乖激之论，宁负君父，不忍负私党，党论之所誉，倒屣奔走，不啻若卿相之荣，虽不可比拟于东汉名节，而习气则类之。"[3]（《英祖实录》卷二四）此处所引化用自苏轼《上韩太尉书》。

正祖时期，奎章阁提学金钟秀上故事六条，主要内容为："惟在殿下密察，而加工耳。苏轼奏曰：'详于小，必略于大。其文密，其实必疏。'"（《正祖实录》卷一一）由于文章内容极好，得到正祖"优批嘉奖之"。 此处所引出自苏轼《上初即位论治道二首》的部分内容。诸如以上借苏轼诗文来佐证自己意见之例，在《实录》中比比皆是。

4.《朝鲜王朝实录》中的苏轼记事特征

《实录》是宫廷里君臣之间的对话，以及全国各地发生的国家实况的真实记录。史官记录此类史实时，原本使用汉字记录，或者依据各种汉语文献来抄写改编。因此，将既成汉文文章直接抄写是不存在任何问题的，而以韩语翻译汉文则有一定难度。尤其在其记录过程中经历初草、中草，最后定稿直至完成整《实录》，其文字表述难免产生一定的出入。因此《实录》上引用的中国古典文献，往往出现文字不甚可考的情况，有些甚至根本无法找到出处，苏轼的文章也不例外。

朝鲜王朝君臣引用苏轼文章时，有时注明为引用，有的是在对话中转引，而其所用语言是韩语而不是汉语，因此其文字表述很可能中国文献存在较大差异，如：

> 上御昼讲，讲《中庸》二十七章。讲讫，知经筵赵絅进曰："殿下砺精图治，而天灾屡见，是虽仁爱之天，欲玉成之，抑由于政事施为，有不合于天心而然也。昔者苏轼言于宋神宗曰：'陛下求治太急，用人太速，听言太过。'臣恐殿下，亦有是病也。（《孝宗实录》卷三）

此处所引苏轼之语，不见于现存苏轼的诗文集内，很可能是将苏轼的某些论断翻译成韩语，而后又转写成汉语，从而导致了巨大的文辞差异。因此，《实录》收录的不少文章，较难找到准确

3）原文为："于是天下之士，嚣然皆有无用之虚名，而不适于实效。故其亡也，如人之病狂，不知堂宇宫室之为安，而号呼奔走，以自颠仆。"（苏轼，〈上韩太尉书〉）

出处。

但是，无论如何，从以上探讨的诸多材料来看，我们能确认的是，朝鲜时期的官僚文人对中国先贤极为推崇，并频繁引用他们的诸多论断或诗文，来充当自己论述或文章的依据。而这其中，苏轼是被引频率最高者之一，而其《上神宗皇帝书》几乎是朝鲜官僚人手必备的一篇名文。

同时我们也要承认，朝鲜王朝对苏轼表现出了褒贬不一的态度，这是因为朝鲜王朝是一个明确地由理学主导的社会，因而官僚和文人首先信奉的是“程朱理学”。虽然，我们此次讨论以《实录》中的苏轼相关材料为中心，但从整部《实录》有关中国文人以及思想家的统计状况来看，比例最高的仍旧是程朱等理学者。

总之，朝鲜王朝的官僚文人既然非常推崇理学，但君臣之间讨论时，经常引用苏轼的很多诗文，尤其是其《上神宗皇帝书》等名文。

本篇论文的材料，主要来自于“韩国古典翻译院”的网站数据，借此探讨《朝鲜王朝实录》中有关苏轼记事的特点，因文献材料的考究程度，难免会产生某些疏忽，但通过以上探讨，大致可以了解朝鲜王室与朝鲜文人对苏轼的褒贬观点和接受模式。（完）

【参考文献】

孔凡礼校，《苏轼文集》，中华书局，1986。
游国恩、王起主编，《中国文学史》，人民文学出版社，1992。
袁行霈主编，《中国文学史》，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
曾枣庄，《苏文彙评》，四川文艺出版社，2000。
《朝鲜王朝实录》 http://sillok.history.go.kr

【논문초록】

키워드 Key Words	중문	朝鲜王朝实录, 唐宋八大家, 苏轼, 上神宗皇帝书, 言官
	영문	*The True Record of the Joseon Dynasty*, Tang Song Badajia, Sushi, *A suggestion recommendation to Shenzong Emperor*, Joseon bureaucrats

A Study on Records about Sushi in *The True Record of the Joseon Dynasty*

Ahn, Hei-Jin

'*The True Record of the Joseon Dynasty*' (1392-1863) is a historical document of the Joseon Dynasty which lasted 519 years with rulings of 27 kings in Korean history. This article examines this document to show how kings and bureaucrats of the Joseon Dynasty perceived works of Su Shi, a famous writer from the Song Dynasty. As a writer of the Song Dynasty, Su Shi had a negative view on the Goryeo Dynasty (918-1392) although his works were regarded as the best writings by the Goryeo and Joseon scholars. All the Joseon bureaucrats read and learnt Su Shi's works. Naturally, the Joseon bureaucrats of the royal palace often cited Su Shi's writings. Many of the Joseon bureaucrats memorized Su Shi's "A suggestion recommendation to Shenzong Emperor." This contained some details of bureaucrats' suggestions to their emperor regarding state administration. For instance, one of the most cited phrase was that it was important duty of bureaucrats to raise their formal counsel to the emperor. Also, Su Shi was often cited when emphasizing the importance of various national events' proceedings. Beside these, Su Shi's view point and ideas had a great influence on Joseon bureaucrats. However, Since the Joseon Dynasty was the center of Neo-Confucianism, however, the idea of Su Shi was somewhat rejected. For this reason, some bureaucrats expressed their explicit objection against Su Shi's works. On the contrary thinkers such as Wang Anshi and Zhu Xi, who were loyal to the kingship, were respected. It was found in this article that quotations of Wang Anshi and Zhi Xi were used much more frequent than Su Shi's quotations in conversations between kings and their servants. In this regard, it can be said that the Joseon Dynasty bureaucrats knew about Su Shi's works, but they had an antipathy toward his ideas.

저 자 인적사항	성 명	안희진 / 安熙珍 / Ahn, Hei-Jin		
	소 속	檀國大學校 外國語大學 中國語科		
	Em@il	china@dankook.ac.kr		

논 문 작성일시	투 고 일	2018년 11월 11일	심 사 일	2018년 11월 19일
	수 정 일	2018년 12월 16일	게재확정일	2018년 12월 21일